

一个人坚守阵地,打退敌人41次冲锋,创造了单兵作战一天歼敌280余人记录——

上甘岭战役中的孤胆英雄

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激烈的反复争夺,双方不断增加兵力,对上甘岭阵地的争夺不断升级。激烈的炮火使得整个上甘岭都被硝烟所笼罩,相隔百米就无法看到信号枪的光亮,双方只好都使用迫击炮发射信号炮弹来进行联络。战斗越来越惨烈,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每次易手就伴随着天翻地覆的炮击和天昏地暗的拼杀,阵地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高地……

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进入了决定性的反击阶段,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和李承晚,发动了上甘岭战役中最猛烈的进攻,攻击的重点就是上甘岭左侧597.9高地。志愿军利用597.9高地周围的大小山头构筑了12个阵地,胡修道所在的5连2班在班长李锋的带领下,与新战士滕土生3人,奉命坚守597.9高地的3号阵地。

少年英雄,初上战场

这是胡修道第一次真枪实弹与敌人拼杀。一阵阵震天动地的排炮过后,敌人开始往上爬,越爬离阵地越近。胡修道看不清来了多少敌人,只顾紧紧抓住爆破筒。听见班长大叫一声“开炮”之后,胡修道才使尽全身力气将爆破筒甩出去,接着不顾一切地甩爆破筒,投手雷,掷手榴弹。当他又要往外甩时,手被班长李锋抓住,胡修道这才知道爬上来的敌人早



胡修道 (资料照片)

已被打退。

“直到班长抓住我的手腕,我才知道敌人早已被打退了。”胡修道风趣地说,“多年来,我一直十分懊悔自己当时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弹药。”——在当时,志愿军的供给艰难,弹药常常比生命还宝贵。

不久,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胡修道和班长先集中火力向分散的敌群两边打,迫使敌人往中间挤,再往前面猛打一阵,让前面的敌人爬不起来,后面的往前拥,等敌人挤到一起时,突然向敌群投手榴弹。这种被称为“包饺子”的方法果然奏效,直打得敌人丢盔弃甲,四散逃命。

在老班长的带领下,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后,胡修道和滕土生都由初上阵的新兵变成“老兵”。当南朝鲜两个排的兵

力又冲了上来,这次,胡修道壮了胆,待敌人靠得很近时,才由滕土生供应弹药,他和班长一个打头,一个拦尾,打得敌人往下滚,抱着脑袋四处乱窜。在班长李锋的指挥下,连续3个小时的激战,打退了敌人向3号阵地10余次的进攻。

这时,9号、10号阵地的战斗也越来越激烈。李锋接到指令前往9号阵地援助,班长一走,3号阵地只剩下胡修道和滕土生两人了。他们抓紧战斗间隙准备弹药,一排排揭开盖的手榴弹摆在身旁,准备随时砸到敌人头上。阵地上的烟雾刚刚散开,敌人的重炮就开始轰炸了,爆炸的气浪扑面,泥土和石块打在身上,可是他们无暇理会,就等着要向发起冲击的敌人。手榴弹和自动枪轮番上阵,胡修道和滕土生又连续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

此时,传来了连指挥所的紧急命令:“10号阵地没人了,敌人攻得正急!”胡修道向旁边阵地观察,10号阵地前面黑压压地爬过来一大片敌人,阵地危在旦夕,如果10号阵地丢了,那597.9高地就要保不住了。他冒着敌人的机枪火力封锁,从一个弹坑滚到另一个弹坑,再从另一个弹坑往前爬,“连滚带爬”地向上猛冲,此时,排长郭三旦从9号阵地过去支援他们,可就在刚进洞的一瞬间,一发炮弹落在他的身边爆炸,排长牺牲了。而战友滕土

生因负重伤被送下火线。阵地上只留下了胡修道一个人。

单兵作战 创歼敌记录

此时,敌人的坦克一个劲地往上爬,几百门火炮一齐发射,飞机也在狂轰滥炸。随后,成群结队的敌军不断地往上涌。胡修道依靠所剩的弹药,孤身坚持战斗,胡修道在3号、10号高地来回不断地打击敌人,手榴弹、手雷一个接一个地向敌军投去,不停地在敌群中爆炸,竟然奇迹般地打退了敌人的十几次进攻。

黄昏时,敌人又一次漫山遍野地昏压过来,周围阵地同时响起了撼天震地的杀声。千钧一发的时刻,志愿军的大部队赶到了,敌军被彻底打垮,战斗胜利结束了。

胡修道最后一个人坚守阵地,打退敌人41次冲锋,创造了单兵作战一天歼敌280余人的记录,不能不说这是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

为了表彰胡修道的英雄事迹,1953年1月1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为他记特等功,并于1953年6月1日,授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同年6月2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同时授予他“一级国旗勋章”和“金星奖章”。

胡修道回国后,长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担任军事指挥员,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副参谋长。他曾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退休后,他经常深入基层连队为官兵作传统教育报告,还担任多所中小学的名誉校长或校外辅导员,被聘为徐州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2002年3月胡修道病逝于南京。“上甘岭上建奇功,英名垂青史;一生奉献忠于党,风范成千古。”这是胡修道同志的挽联,也是老英雄一生的写照。
鲍宇雁 梅旭航(摘自环球网)

参与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摆脱战场上和谈判中的被动处境,于10月14日,集中兵力、火力,向志愿军部队发动了自1951年秋季以来规模最大的以上甘岭地区为主要进攻目标的“金化攻势”,这就是侵朝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所谓的“摊牌计划”。

上甘岭战役的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二次大战最高水平,其中美军攻势最猛烈、火力最集中的就是五圣山前沿的597.9和537.7高地。

为争夺这两个高地,中国

苏轼善食之趣屡见于两宋士人笔记。无论是与之相识的北宋时人,还是南宋诸多作者,皆在笔记中不吝笔墨,大加描摹。吕希哲曾记元祐年间苏轼戏谑事。苏轼赞熟肉味美,而范淳夫告诫其多食则易发痛风,苏轼笑谓淳夫诬告肉食。篇章虽短小,已勾勒出苏轼贪食善谑的形象。苏轼爱美食已为时人所知,被贬黄州时,亲自烹调,教会那些不善烹煮的贫困农人善用食材,“洗净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此之谓东坡肉。之后,又教过当地人如何烹鱼与酿蜜酒。彼时苏轼亦是拮据,却也依旧关心当地民生。但与之营救黄州弃婴而组织的雪堂孤儿会相比,为红烧肉撰写的“火候足时他自美”之诗反而流传度更广,或许正是因为符合受众对苏轼谐趣的印象。

类似的叙事还见于邵博《邵氏闻见录》。经筵官员于资善堂会食,听苏轼盛赞河豚味

美,便问河豚是何种滋味,苏轼回复简约绝妙:“直(值)那一死。”河豚味美且有剧毒为天下所知,而在苏轼看来,河豚滋味之美难以直接言说,便为尝鲜而身死,亦是值得。

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痛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鼎饭,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鼎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羹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龌

苏轼的善食之趣

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三白”故事此后屡见于宋人笔记,而叙事主人公或有所变更。如曾慥《高斋漫录》所记,钱穆父邀苏轼食鼎饭,亦是设饭一杯、萝卜一碟、白汤一盏而已。宴邀之前记有苏轼的宴饮观,“寻常往来,须称家有无;草草相聚,不必过为具”,豁达、简约的生活态度跃然纸上。

苏轼一生跌宕起伏。据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苏轼兄弟双双被贬岭南时,曾于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见道旁有人卖汤饼,便共食于道。荒郊野岭,食物滋味糟糕,简直“脍恶不可食”。苏轼食之殆尽,见一旁苏辙对箸叹气,忍不住大笑:如此脍恶的食物不一气吃完,难道

还要细细咀嚼品味吗?此时苏轼已近花甲,此或是兄弟二人最后一次同食。荒村、恶食、老迈、贫病,人世诸多艰险,皆付笑谈中。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末孙奕的《履斋

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南宋末,文士盛赞苏轼诗文,称自其中识得“货之品、菜之品、果之品”等,便是苏轼善食指向发生变化的证言。苏轼是见证过宋世繁华风流的士人,是承平时期的典范。文献史料中,苏轼多面而复杂,而苏轼善食书写的变迁,最为直接地体现了后世的仰慕与接受。人们喜爱的,是才行高世、遇人温厚、“闲以谈谑”的苏轼。其人善食带着满怀生机的赤子之趣,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与象征。

(摘自《人民日报》)

